

深圳市档案馆编

明清两朝

深圳档案文献演绎

K286.53
56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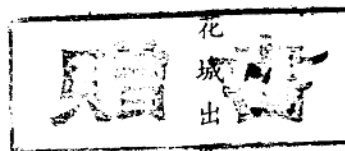
名誉主编
主编

李德成
舒国雄

副主编

李国庆
唐国彬(执笔)

刘中国(执笔)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A09938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舒国雄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10

ISBN 7-5360-3367-2

I. 明… II. 舒… III. 地方史-档案资料-深圳市-明清时代
IV. 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161 号

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

深圳市档案馆编 (1-4 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深圳商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7.75 印张 4 插页 1500,000 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367-2

K·30 定价: 1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十五章

割据九龙 毛瑟枪下双城记

这是英国侵略者最好的年头，这是中华民族最坏的年头；这是大英帝国狡黠多谋的年代，这是大清帝国愚昧无能的年代；这是米字旗下一片光明的季节，这是黄龙旗下漆黑一团的季节；在日不落帝国面前万物俱全，在大清帝国面前一无所有；英国人一步登上天堂，中国人一头跌进地狱。

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1860年3月20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大案。兹大清大皇帝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拼归英居香港界内，以期该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

——中英《北京条约》

1859年，英国作家狄更斯为其长篇小说《双城记》划了个句号。在这部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实的经典佳作里，狄更斯开篇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传世名言：“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在我们面前万物俱全，在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当个体的生命面临某项重大抉择时，我们想起这段话。

当我们激情昂扬地参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时，会想起这段话。

回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坎坷多艰的脚踪时，我们

还会记起这段话。

当最后的日子来临，当你躺在临终的病榻上，也许你还会想起这段话。

就在《双城记》面世这一年，狄更斯的同胞——那帮手托毛瑟枪的英军士兵们，也写了一部《双城记》。只不过这部《双城记》不是用毛笔写在纸上，而是用刺刀蘸着中国人民的鲜血，写在中国的土地上——英国侵略者用武力强占了新安县的九龙半岛。

从此，九龙半岛与香港岛上的维多利亚城，一南一北，隔海相望，成为英国统治下的双城。

在这部血腥味扑鼻的“双城记”中，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名言，只需稍微换几个字就行了：这是英国侵略者最美好的年头，这是中华民族最糟糕的年头；这是米字旗下一片光明的季节，这是黄龙旗下漆黑一团的季节；这是大英帝国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大清帝国充满绝望的冬天；在日不落帝国面前万物俱全，在大清帝国面前一无所有；英国人一步登上天堂，中华民族一头跌进地狱……

这部用刺刀蘸着中国人民鲜血写成的“双城记”，要从“亚罗号事件”谈起。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满以为凭借侵略特权，可以在中国广销工业品，牟取巨额利润。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契尔在写给香港总督的报告中就兴致勃勃地提到：英国资产阶级“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告诉他们，说是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产品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

但是，不管是米契尔也好，璞鼎查也罢，他们的一腔勃勃兴致马上就变得稀松萎顿，因为从1843年到1855年，英国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造成这种“奇怪的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鸦片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无钱再买其他的英国工业品。

当时居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也看出了这一点：“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合法贸易不相容的”，“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

昨夜的黑甜梦转眼间化为今晨醒来时的厄运，梦的主人狠狠地拍一下脑壳，实在是义愤填膺。只是他们不去检点一己的过失，而把过失委罪他人。

日不落帝国的梦想家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开放”得还不够，因此必须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

1856年至1860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首先发难，曲解中美《望夏条约》关于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动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紧紧附合，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

1856年，《望夏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

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英、法也提出同样要求，仍被清政府拒绝。此时英、法与俄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于是英、法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侵华战争。

1856年10月8日，广州黄埔港内和往常一样，平静而繁忙。突然，从“亚罗”号船上传出一阵争吵声。原来，广州水师接到举报，说“亚罗”号上的水手中，有一些是海盗。水师提督即派千总梁国定率部下登船捕匪。“亚罗”号船长仗着自己是英国人，根本不把清军放在眼里，口气傲慢地拒绝梁国定盘问抓人。梁国定奉命而来，自然也不甘示弱，经过一番争辩，最后还是从船上抓走了两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

这就是所谓“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是一艘走私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但已过期。清军在中国船上抓捕中国海盗，本来与英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亚罗”号在香港注过册，船长是英国人为理由，声称清军上船抓人侵犯了英国的利益。要求两广总督叶铭琛在24小时内赔偿损失，放回人犯，赔礼道歉，“如逾期不允所请，即进兵攻城”。

叶铭琛先是严辞拒绝，继而害怕事态扩大，就按巴夏礼的要求将逮捕的水手送到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原以为自己的要求没有道理，叶铭琛不会接受，这样就有了挑起战争的借口，但没想到叶铭琛竟然完全按英国的要求办了，倒弄得他有些骑虎难下。于是，索性耍起赖来，刁难叶铭琛礼貌不周，拒不接受送来的被捕水手。

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率军舰攻打广州，突入珠江，占领沿路各炮

台；27日，炮轰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由于“亚罗号事件”只是一个借口，而且是个很不体面的借口，所以英国殖民者在挑起战争的目的达到以后，就不大愿意再提起这件事情。连英国派到中国来的侵略军司令额尔金，在他写给妻子的书信中也坦白承认：“这个恶浊的亚罗号问题，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并且我知道，除少数有关人员之外，都是这样想的。”

英国的侵略行径激广东军民的反抗，深港地区中国居民奋不顾身地行动起来，把斗争矛头指向英军后方老巢香港岛。

1856年12月19日（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安县全县士绅在南头城明伦堂聚会，同仇敌忾，议决严禁向香港供应食物，并号召“本县百姓在裙带路（裙带路位于香港岛北部，亦为港岛别称）开设店铺者，一概停止交易。从本月二十二日起，限一个月内回家”。

港岛中国居民响应号召，纷纷关闭店铺，辞掉工作，返回内地。永泰、和生、万泰等三家米铺率先停止营业。据当时的一份探报说：“各庄口凡唐人大半告去”，“在港华民纷纷还乡”。

为了打击英国侵略者的凶焰，新安县自发成立了“抗敌会”。抗敌会会长陈桂籍委派他的弟弟、举人陈芝亭率领乡勇前往九龙，协助九龙寨城官兵进行抗英活动。他们截获向香港偷运物资的船只，袭击零散的英军，刺探香港敌情，组织和鼓动港岛的中国居民参加抗英斗争。

抗英怒潮，拍岸滔天，港英当局再次小觑了一个恪守“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的另一面。为镇压中国居民的抗英斗

争，香港总督颁布了《维持地方治安法例》，规定由警察司颁发“夜纸”（夜间通行证），香港的中国居民一旦被疑为所谓“密探”、“海盗”、“煽动者”，就要遭受鞭笞刑罚并带枷示众。

面对中国人民高昂的反侵略斗争，港英当局色厉内荏，草木皆兵。爱国人士陈芝亭在一封信中介绍香港情况说：“看来英夷戒备更加森严，他们定时打炮维持士气；20艘大小不一的汽船和其他船只，日夜巡逻不停。每家鬼子商行都有鬼子兵站岗；一到日落西山，他们就小心翼翼做好开炮准备。鬼子警察18人为一队巡逻，走到危险地带，他们就汇集成较大的队伍，并在冒险前进之前开炮射击。”

在港英当局神经高度紧张时期，香港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毒面包案”。

1857年1月15日早晨，香港三、四百名英国人因食用面包，程度不同地中了毒，经化验发现面包里含砒霜，因为砒霜剂量过大，食用面包后引起呕吐，反而保全了他们的性命。英国报纸借此大造舆论，首相巴麦尊还在议会上发表激烈的长篇演说，攻击“中国人毒杀可敬的英国商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毒面包案等事件加以评论，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彻底实行，就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1857年春，“亚罗”号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

麦尊主张对华开战，但议员对此态度并不一致。议会展开了激烈辩论，通过对巴麦尊内阁的不信任案。巴麦尊解散议会。议会改选，巴麦尊派获得下院的多数议席，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3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建议法国政府共同行动。

在此之前，法国正借口“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进行诈索。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法国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便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以“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率军来华。

九龙成为抗英斗争的前哨地，港英当局对此恨之入骨。1857年4月20日，港督召集行政局会议，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强行要求驻守九龙寨城的大鹏协副将张玉堂，引渡抗英爱国人士，遭张玉堂拒绝。次日，英军袭击九龙寨城，英国侵略者把张玉堂劫持到香港，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舰到达香港。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先后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24、27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等发出通牒，第二次通牒限48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

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激起广东人民的强烈反抗，士绅纷纷团练募勇自卫，设局于石井，驱逐英国侵略者。

清廷在授予黄宗汉两广总督的同时，于1858年2月15日谕令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等三绅士团练。三绅奉命后，筹办团练总局，开局于顺德，后迁花县，计有：石井乡团练，南海九十六乡团勇，香山绅士林福盛、东莞孝廉何仁山、新安主事陈桂籍所带的团勇（原驻城内，英法联军占广州城后，林勇驻石井，何勇、陈勇驻东路的榕树头）。

在团练总局内，三绅与原各地团勇之间目的不尽相同，三绅有很大的动摇性、妥协性，最后甚至出卖、破坏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与三绅不同的是，各基层团练壮勇，旨在保卫乡里、反对侵略，所以同仇敌忾、斗志旺盛。他们主动打击侵略者，取得过一些胜利，立过一些战功。

1858年5月，东莞勇在英军驻地将军署门口张贴挑战书（张贴战书使人想到《三国演义》，充分展示了仁义之邦的愚腐）。6月3日，侵略军出城，分两路进攻练勇。一路扑向东莞勇驻地榕树头，千总邓安邦督勇迎战。东莞勇预先于树林僻径节节埋伏，俟敌人深入，出而截杀。敌军大败，纷纷逃窜。另一路侵略军进攻三宝圩，陈桂籍率新安勇鏖战，并有龙眼洞乡勇助战。激战5小时，练勇大胜，毙伤侵略军百余名；练勇亦伤10余名，阵亡6人。

1858年6月以来，日夜皆有练勇到城攻打，以小队潜伏城内，袭击、困扰敌人，英法侵略军士兵被杀被俘事件时有发生。侵略者惶惶不安，惊慌地承认：“除非成群结队，否则简直无法出门”。只得固守城内，挑诱不出。

广东爱国官绅和团练总局还发布告示，以“绝贸易、断接济、禁服役”，打击敌人。号召对港英当局实行制裁：“行封港之法，绝其贸易接济，凡敢私买卖者、拿获治罪。为洋人服役所谓沙门者，及代为驾火轮船划艇者，限十日回家，不准逗留，违者缉获治罪，并罪及本家亲属，三代不许应试！”

告示一出，大批华人离港。由于封港政策的实施，香港物价暴涨，食物匮乏，英国殖民者惊呼：无人做工，日常生活完全瘫痪，“受到商品供应完全断绝的威胁”！

港督拟定中英文通告，在港岛四处张贴，指责号召华人返乡和禁运食物来港者为“大英国家之大敌”。

在香港工作的2万多名中国工人罢工回家，使香港物价贵10倍。省城内外商民更是迁徙一空，原来繁华的西关，白天也见不到人，商务停顿，逼得入侵者只能从香港运牛到广州宰食。

为了摆脱困境，1858年8月3日，英军驾驶火轮船及舢板到新安县南头城地方登岸，张贴招诱华人复工的告示，被该乡壮勇击伤数名后撤走。8月11日，英军前往报复，几十只船载侵略军3000多人，驶近新安城登岸，用火炮火箭射击，西门城墙被轰开缺口数十丈，敌军冲入城内。原来在城外防守的壮勇闻讯回援，与英军激战3小时，伤毙英军百余人，英军被迫撤退。

对于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恩格斯予以深切同情和高度评价，他于1857年6月5日在《约纽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波斯和中国》一文，赞扬中华民族的觉醒。恩格斯写道：“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

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这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英国侵略者攻陷广州后，立即把魔爪伸向了九龙半岛。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就觊觎着九龙半岛。林则徐当时就曾指出，九龙“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怡浪静，水势宽深，英夷久欲依为巢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国船只经常藉故在九龙尖沙咀一带停泊，并且屡屡上岸滋事。

1841年1月14日，义律曾对琦善提出将九龙尖沙咀、香港等处“让与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的要求。次年，英军一度在尖沙咀秘密修造营房炮台，派兵驻守，以图久占，被赖恩爵率兵驱除。随后，英国方面从政府首相到殖民大臣、外交大臣、陆海军将领以至香港总督，均相继发表了要求割占九龙的言论，普遍认为，占领九龙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这种占领“刻不容缓”。

1843年7月29日，英军少校奥尔德里奇就曾建议在青洲岛修筑工事，占据昂船洲并在该岛设防。四年以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提出并首次论证了割占九龙半岛的种种“理由”。1847年8月14日，他在致皇家工兵司令的信函中写道：

我认为迫切需要占有九龙半岛和昂船洲，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其落入诋谰英国殖民地的任何外国之手，而且是为了给日益发展的香港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和必需的供应。占有九龙半岛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台风季节它是保障我们船舶安全唯一的、必不可少的避风地。我们决不应该忽视这种极其重要占领。

由于当时英国政府对九龙半岛奉行“沉默政策”，主张暂不采取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上述进一步割占中国领土的建议提出后，并未受到青睐。

后来，经过1854年广东各地天地会起义，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城，特别是1854年8月天地会起义军攻占九龙城和1857年4月的英军借故劫持驻扎九龙寨城的大鹏协副将张玉堂事件，更是把清朝官员的怯懦无能和清军的不堪一击，完全暴露在侵略者的面前。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向敌人投降。英国当局任命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等三人担任“大英法会理华洋政务总局正使司”，对广州实行军事统治，监督和指挥柏贵行使傀儡政权职能。而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却任命柏贵为“署理钦差大臣”。

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58年春，参加侵华战争的一些英国军官重新提出了割占九龙半岛的建议。

1858年3月2日，“加尔各答”号舰长霍尔鼓吹：“时候到了！苹果熟了！现在是割占九龙岬角和昂船洲的良好时

机！”

他列举了割占上述地方的种种藉口：香港殖民地发展迅速，所有临海土地已被占用。随着贸易的增长，需要在九龙为商行和仓库提供许多设施，出租或出售这些设施将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为了保护英国在远东日益增长的利益，需要“扩大和增加”海军基地，而香港不能为来华英军提供足够的宿营地。在台风季节，尖沙咀的村庄成为香港流民“出没之地和窝藏场所”，他们可能利用满载易燃物的小船向船舶发动攻击。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船坞、给养站、海军医院和司令官邸都应修筑在该地”。此外，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能在九龙或昂船洲建造修船厂，有军舰停靠在附近，把大炮指向香港方向。

霍尔的鼓噪声刚停下不久，驻扎广州的英军司令斯托宾齐少将也向驻华全权特使额尔金提议割占九龙半岛。斯托宾写道：

它在我们手里对我们的船只有利；反之，今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占有了它，不仅会危害我们的船只，还会危害维多利亚城（即香港市区）本身。

除了呈上自己的信件，斯托宾还将西马糜各厘等“某些杰出军官”鼓吹割占该地的意见，摘要转呈额尔金。

英军将领关于割占九龙半岛和昂船洲的建议送达伦敦以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首肯。1858年6月2日，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写信命令额尔金：“一旦出现机会，应竭力通过条约从中国政府手中将这些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至少要割占

香港对面的九龙岬角。”

额尔金接到这一指令时，中英《天津条约》已经签订，错过了提出割让要求的时机。但是他明确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乐于在离开中国以前解决这个问题。

获知英军将领的意向之后，香港总督包令于1858年8月20日写信给殖民地大臣利顿附议说：“我赞同这种意见：占据这块对中国人没有用处的土地，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商业、保健和警务方面，对我们具有极大的价值。”

鉴于《天津条约》已经签订，包令建议与两广总督谈判这个问题，并毛遂自荐承担这项工作。

1858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卜鲁斯为驻华公使。次年4月，卜鲁斯抵达香港。在香港逗留期间，他与侵华英军首脑讨论了带兵北上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的安排；同时，就夺取九龙半岛的问题，多次找香港辅政司马撒尔谈话。离开香港之日，他要求马撒尔就九龙半岛问题拟定一份备忘录寄给他，“目的是同北方的中华帝国当局进行谈判。”

马撒尔奉命炮制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从对香港的“好处”、中国人的得失、占领土地的范围和给中国政府的补偿等方面，对割占九龙半岛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

由于6月下旬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遭到惨败。卜鲁斯未能完成换约的使命，更未能就九龙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马撒尔的备忘录当时没有派上用场。但这份文件仍有其历史价值，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出，为了割占别国人领土，殖民主义者是怎样挖空心思编造种种荒诞不经的藉口。

这份备忘录由香港护理总督威廉·坚转呈伦敦时，英国新一届内阁已经就职。罗素任外交大臣，纽卡斯尔任殖民地